常州城镇化样本

镇上的企业越来越多,就业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工资收入也年年都在上涨,这让拆迁后住进小区的我们,心里更有底了。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真怀念以前的日子,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但自家的楼房,楼上楼下、门前房后、种菜养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就连春节要放个鞭炮都要跑到楼下的休闲广场指定区域,规矩太多”。

2010年受到常州机场扩建工程整体建设规划,家位新北区罗溪镇的徐鸣一家成为亲戚朋友羡慕声中的“拆迁户”,最终,其获得的拆迁赔偿款换来4套80平方米—120平方米不等的商品房以及30多万元的现金。

2013年春节,已经住上拆迁安置小区装修好的新房时,徐鸣却带着复杂的心怀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没拆迁前想着通过拆迁安置能发财致富,实际上拆迁并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想致富还是得靠双手,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

小区的很多绿化花坛和绿色带,都被一些住在一楼二楼的农民“捷足先登”,改造成为“自家菜地”

靠拆迁致富已成梦幻,腾出宅基地成工商用地

2012年,音乐人左小祖咒的数条微博,迅速将常州市新北区及南夏墅街道推向风口浪尖。其岳父母位于南夏墅街道钱家塘的一幢前后两栋两层老式楼房,在与当地政府还没有就具体的赔偿款谈妥之前,就遭遇当地政府的“拆迁”逼近。

一位新北当地的新闻媒体同行介绍,“这几年来,新北的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临近乡镇,像鸣凰、马杭等都被一个村一个村的整体拆迁,搬进政府统一建设的拆迁安置小区,他们腾出来的宅基地则成为工业厂房和商业楼盘的用地。”

拆迁开始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重要“捷径”之一。徐鸣透露,“很多人在没拆迁之前,都想着要做钉子户,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想多要一些钱。左小祖咒岳父之所以迟迟没拆迁,就是因为赔偿款没谈好。人人都想多要,但政府只能给那些钱”。

据悉,目前新北区的农村拆迁补偿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对现有房屋的拆除赔偿款1000元每平方米,同时还会根据房屋装修程度给予200元的浮动补贴。二是购买保障房的价格优惠,一般来说拥有当地户口的村民往往每人可以以650元左右的优惠价购买40平方米的房屋,超出这一面积就要以1000元,甚至2000元的价格购买。

徐鸣给《中国企业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家房产本的面积是600平方米,可以获得补偿款60万元,购买4套房子花了30多万元,最终剩下的现金只够装修两套房子,没能发家致富,但成了房主”。

拆迁开始,很多农民向政府拆迁人员直接开价“200万、300万”,但最终在拆迁过程中实现“致富”的农民却很少见。《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在新北各地的农村拆迁中,也出现过几户一次性获得赔偿款200万的情况,但主要是一户家庭多个儿子,因为宅基地面积大获得的补偿款较多。

农民进城,直接刺激家电建材消费

住进规划整齐、配套设施齐全的拆迁安置小区后,曾经一度让不少新北的农民,顿时产生了进城做“产业工人”的感觉。

不过,很快就有居民发现,小区统一配套建设的休闲广场,变成了晒稻谷、晒干菜的晾晒场,小区的健身器材也经常“缺胳膊少腿”,甚至就连小区的很多绿化花坛和绿色带,都被一些住在一楼二楼的农民“捷足先登”,改造成为“自家菜地”,时不时还拿家里的大小便浇菜,让整个小区的环境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变样。

在徐鸣所在的小区附近,建起了大超市、大农贸市场,就连苏宁电器和当地知名的家居建材广场都在附近开出直营连锁门店,这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生活成本的增加。

“虽然我们都进城上楼,但是家里还是有一些自留地,平时会种些水稻和油菜。而且,以前家里门前屋后都有空地种点蔬菜,养点鸡鸭什么的,可以补贴日常开销。现在,进入小区什么都要买,家里的开销一下子大了起来。”徐鸣坦言,住进小区之后,生活环境确实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家里老人还是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很多传统习惯在未来一段时间很难改掉。

“农民进城,直接刺激的是家居家电建材等耐用消费品,长期刺激的是商业超市和农贸市场等日用消费品。但关键还是要进城的农民腰包也能持续鼓起来。”来自常州苏宁电器的门店经理如是说。

徐鸣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徐昕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我爸爸这一辈还是觉得进城上楼比较好,在我爷爷这一辈,年纪大了,很多生活习惯都改不过来。反正,我今后是不会留在镇上工作,是要在常州市区找一份好工作”。

尽管拆迁的补偿款已所剩无几,由于最近十多年来,徐鸣和妻子都在镇上的集体企业上班,每个月有4500元左右的固定收入,工厂还给统一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由于土地被征用,村里每年还给每人3000元的口粮补贴以及并不固定的村集体企业分红。

“平时,家里的日常开销就是衣食住行和女儿上学的费用,应该说收支核算下来每年还有几万块钱的结余。”徐鸣认为,靠拆迁致富都是“谣言”,要想致富还要靠双方,新北的乡镇经济发展很好,只要肯干就一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小村并大村,大村拆迁进城”成趋势

作为苏锡常经济带中的重要板块,近年来常州市新北区的城镇化建设步伐明显加速。上述新北媒体同行就透露,“作为连续多年位于全国百强县前十强的地区,新北的各个乡镇都形成了各自的经济产业带,这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速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土壤,让很多通过拆迁住进楼上的农民,不仅硬件条件要改善,还要让腰包鼓起来,腰杆子也挺起来,只有软硬兼施才能形成一个城镇化的正循环”。

以新北罗溪镇为例,通过借助常州机场“空港物流基地”的建设,迅速带动了当地在化工、物流等领域的大项目建设和工业园布局。徐鸣则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镇上的企业越来越多,就业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工资收入也年年都在上涨,这让拆迁后住进小区的我们,心里更有底了”。

目前,以“小村并大村,大村拆迁直接进城上楼”的城镇化,在全国各地陆续拉开,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与全国很多其它地区相比,常州由于各个乡镇的工业经济发展基础好,各种大中规模的民私营企业众多,为进城的农民提供了很好的经济收入保障。

进京,还是回乡?

本报记者 **张龙**

搬进北京快半年了,刘女士仍然没有习惯这“四九城”的生活。儿子在北京工作,去年在北京的南城菜市口附近给刘女士买了一套房,让刘女士过来养老,同时可以更加方便地照顾老人。

除了儿子、儿媳,刘女士在北京没有任何的亲戚和朋友,这让刘女士倍感孤单,尽管是从北京的郊区搬过来的,刘女士在语言上和“城里人”明显不一样,为此,刘女士不得不天天学习北京话。

“真是不习惯,连北京都没出,居然语言也是问题。”刘女士哭笑不得。

在北城的亚运村,22岁的任远租住在这里的一家半地下室里。任远怀揣着梦想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一个村子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已经4个月了,任远却越来越觉得迷茫。

在北京,“钱花得我都心疼”

刘女士每个月都能从儿子那里拿到2000元的生活费,最开始刘女士觉得给的太多了,但到后来,刘女士发现这钱很容易就花没了。

“去趟超市得花100元到200元,也没觉得买了啥东西。钱花得我都心疼。”刘女士说。这要在老家,2000元钱起码能花3个月或4个月。

城里人都认品牌货,稍微便宜点的都不穿。这是给刘女士最大的感触。

“我刚进城的时候咬着牙给孙子买了双500多元的鞋,我孙子说这样的鞋穿不出去,太差了,怎么也得1000多元的才穿,我心里当时就震撼了。”刘女士说。

如果在郊区的话,穿再好的衣服或鞋子,别人最多会说:“这东西不错。”根本不会关注是什么品牌。

鞋子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任远身上。刚到北京时,任远穿的是一双100元左右的鞋子,这在张家口,算是不错的鞋了。任远到新单位上班时,他穿的鞋价格在同事中是最便宜的,他的一些同事因此曾嘲讽过他,这让任远感到脸上无光。

拿到第1个月的工资时,任远咬牙买了一双800多元的耐克鞋,而当时任远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元。

“那么贵的鞋,我开始每天都擦。”任远说。

和刘女士到北京来养老不同,任远是带着梦想来的,希望在北京能发财。

同村来的几个伙伴都是学电脑美术设计的,任远在张家口学了半年这个课程之后,来到了北京。

“挣得比在张家口要多,但要租房,吃饭也不敢吃太好的。每个月的支出就得2000多,每个月存不下什么钱。我一度也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任远说。

回张家口,开个小饭馆

这花花绿绿的大都市似乎不是为任远和刘女士准备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与这座城市有点格格不入。

作为年轻人,任远也喜欢苹果手机,公司里一些有钱的同事都拿着苹果手机。而对于任远而言,这样一部手机,需要任远两个月不吃不喝。

刘女士并没有被钱困扰,真正困扰她的是没有事情可干。“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每天无所事事,我还年轻,要是能有轻松点的工作可做,生活也不会那么无聊。”刘女士说。

如果在郊区的老家,没事干的时候就算是出去帮别人打扫卫生,也比在这城市里待着强。这就是刘女士真实的想法。

在刘女士看来,现在城市里像他这样60岁左右的女性有很多,大部分人都没有事可做。如果能有人组织这些人做一项工作,也算是不错的廉价劳动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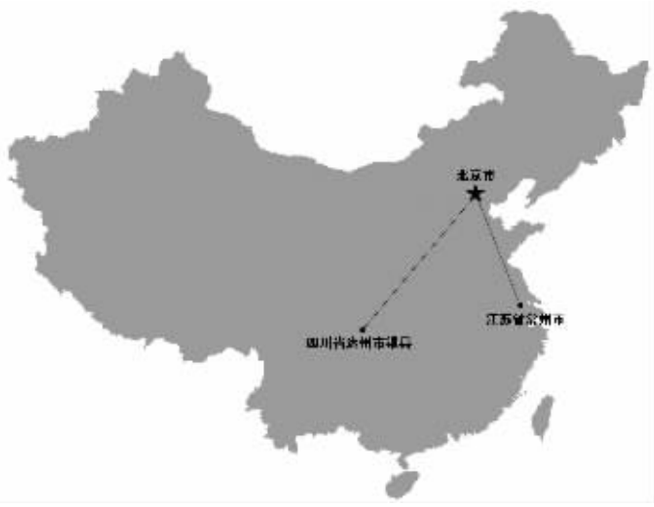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任远的老板给任远每月涨了500元的工资,过节之前,还给了2000元过节费,但这并没有让任远过于开心。

“凭什么别人用的都是好的,我却只能蜗居在半地下室,我过完年不想再回来了。”任远说。

任远已经有了一个想法,想在年后考察一下张家口的地段,准备开个小饭馆,自己当老板。这也是同他一起到北京闯荡的同村伙伴的想法。

“几个人凑点,再问亲戚朋友借点,我们想回去干,在这里总有一种‘飘’着的感觉。在张家口就算一个月挣1500元,也比在北京活得舒服。北京对于我们这种什么都没有的人来说,奋斗起来太难了。”经过几个月漂泊的任远说这话的时候充满着感慨。

而刘女士也打算等天气暖和之后,回老家待一段时间。



新生代农民工阿康的选择

罗小清

阿康在过年前一个月从广州的一个皮具厂辞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四川渠县龙凤乡老家。因为他刚花光了十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老家镇上买了一套住房,全家高高兴兴地回去看一看。可是对于年后在哪里发展,阿康的心中还没有答案。

困境

阿康1982年出生,今年已经31岁,他16岁初中毕业后就到深圳打工,后来辗转到广州,换过好几家工厂。他22岁娶媳妇,没有花什么钱,攒了15年,攒下一套在镇上的房子,有了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

一家四口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挤着,阿康和妻子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二点,累点苦点都不算什么,看到孩子活泼可爱、能歌善舞,阿康就很满足了。可是肩上的压力也很大:两个孩子在广州念书一年的学费就需要一万多,新买的房子还要装修,老家倒塌的房子还要修葺,并且买房子还欠下好几万的债务。

阿康所在的工厂现在效益不太好,为了节省成本,招了一批没什么经验的新员工,他和妻子手里的活就少了,工资也少了。所以他想换一份工作,再苦再累也无所谓,只要工资高点就行。而两个孩子也要送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抚养,因为老家的学校减免学费,在广州,作为外地人的子女入学,每人每学期需要多交3000元的借读费。阿康想省下这笔钱,妻子却不舍得孩子,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成为留守儿童。因为在她的印象中,“留守儿童是又脏又黑,流着鼻涕满山遍野疯跑,完全不听爷爷奶奶管教的野孩子”。阿康的妻子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做一个文明人。

阿康和妻子其实都不愿意回老家的,因为在老家乡镇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而在县城打工,一是可选择的工作太少,二是工资也太低了。妻子如果去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只有800元,阿康去水泥厂、砖厂,一个月也只有1200元,何时才能还上那些债呀?阿康也不愿意回老家种地,老家山脚下的几亩田地,零碎分散、土壤贫瘠,种出的粮食只够全家一年的口粮。养两头猪吧,粮食都不够猪吃,还需要去山上寻野菜做猪食。

进大城市?

阿康真正感到穷困是因为他看到别人家有两个儿子的,都在老家县城或成都买了房子,而自己只在乡镇买了个房子,还是借债买的。究其原因,阿康觉得主要是别人家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去广东打工了,而阿康的父母在阿康十多岁的时候仍守着老家那片贫穷的土地不舍得离开。阿康曾埋怨母亲:“如果你早点出去打工,我早就买上房子了!别人家的父母给儿子很多钱买房,而我买房你们一分钱都没出!”阿康的母亲听着都快哭了。阿康兄弟姐妹两个,有一个妹妹,阿康和妹妹小时候没有爷爷奶奶抚养,都是母亲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农忙的时候,母亲就把两个小孩放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孩子。而阿康的父亲一直在煤矿工厂打工,以微薄的工资供两个孩子读书,因为长期在煤尘环境下作业以致染上了尘肺病。

阿康的几个叔叔和舅舅1989年就来到广州打工,有的在做建筑工人,有的在开车,有的在做废品回收,他们都为自己的后代在四川的大城市买好了房子。阿康每次到广州都很震撼,因为阿康花钱能省则省,而在阿康看来,叔叔、舅舅他们都很奢侈,打牌一天就输掉好几百甚至上千元,一天消费的饮料和烟酒就够他好多天的生活费了。但是舅舅他们是挣得多所以花得也阔气一些,阿康很羡慕,多希望自己也可以全款买房,不用节衣缩食,不用因为自己的孩子要买一个小玩具而责备他们。

阿康对舅舅说,只要能挣钱,在广州他什么苦都能吃,他再也不愿意在工厂里打工了。阿康的妻子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她看到舅舅、舅妈他们在广州的生活也有困窘的一面。舅舅、舅妈在老家有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但是他们在广州却蜗居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黑屋里。舅舅住的那一片全是十几层的高楼,但楼与楼之间的巷道宽度仅一米左右,即使底层的出租屋有窗,但也没有光亮,终日阴气沉沉,黑暗吞没了这些街巷,人像永远被埋没在梦魇中,了无生气。高楼之间还有纵横交错的污水沟,又黑又臭,每个巷角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都是老鼠的盛宴,老鼠们终日狂欢,明目张胆地在街巷上跑来跑去。阿康的妻子说:“这不是我向往的大城市。”她问舅妈:“对面的高楼那么灯火辉煌,你们去玩过吗?”舅妈说:“没有去过,因为那边不用拆迁,所以没有工地,也没有垃圾(回收)。”

(下转第十一版)